

中华文明中的“一以贯之”*

——论“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逻辑

刘 震

[摘 要]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具有内在逻辑与有机联系。“五个突出特性”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存在互为依托的动态关系：连续性为根基，创新性为动力，统一性为框架，包容性与和平性为实践导向。同时，“五个突出特性”具有时空维度的关联：连续性与创新性构建时间维度的传承与突破，统一性与包容性塑造空间维度的多元一体，和平性则为文明价值观的重要表达。通过阐释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特质，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并非静态延续，而是以“守正创新”的方式辩证发展，这体现了文明内核的稳定性与时代适应性的统一。经由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论证，阐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逻辑，可以为理解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提供系统性框架。

[关键词] 五个突出特性 内在逻辑 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 B0-0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2023年b，第5页）“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这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发展和内在机理研究”（编号23&ZD011）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主要遵循。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关键路径，便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深入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牢牢把握“五个突出特性”，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谈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突出”。所谓“突出”特性，就在于可以通过对其结构的分析，准确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全貌。同时从“五个突出特性”入手，可以最为直接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坚实基础。

笔者认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必须从其内在的学理脉络入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之间的内在逻辑是：它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连续性是基础和前提，创新性是连续性的保证，统一性建立在连续性和创新性基础上，包容性是统一性的应有之义，和平性是包容性的必然结果。“五个突出特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因此，笔者遵循这条逻辑线索，通过对于“五个突出特性”的分析与解读，来寻求“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之道。

一 赓续不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自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至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连续的生命力和韧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的连贯性上，更深刻地烙印在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延续中。

中华文明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发展过程清晰、完整。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隶书、楷书，直至现代的简体楷书，尽管汉字的字形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其构字原则始终保持着稳定性。《周礼·地官》最早提出“六书”概念，《汉书》进一步指出，“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书·艺文志》）。这六种分析字形、字义和用法的基本理论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今汉字，使得今人能够辨识古代文字，理解古代文明。同时，古今汉语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虽存在显著差异，但语法结构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这种“一以贯之”的稳定性使得后人能够沿着历代前人的解读路径，逐步理解前人文献。在文化传承中，语言文字作为一种重要载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诸多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度，其文化传承亦是以汉字为载体，这就为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提供了方便。正是汉字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在社会制度层面，中华传统礼法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从夏商周时期的礼制初创，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变革，再到秦汉以后礼法制度的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华传统礼法一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这种演进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变化，更是一种对深入人心的文化理念和道德价值的不断追求。在中华大地上，礼法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相互融合。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日常生活习俗，还是夫妇长幼等人际关系处理，都深受礼法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礼法的演进虽然在不同时代体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但其核心是“一以贯之”的。正如《论语》所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这段文字中，孔子十分精准地把握到礼法中的连续性，而正是这种礼法的连续性，造就了中华文明在思想上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汉唐时期的儒释道融合，再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各时期的哲学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发展上，后世哲学家往往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深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哲学体系。“将历史划入自身的同时，也将自身化入历史，因为历史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连续，所以将自身化入历史，也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汇入无限的时间洪流之中，让个体的文化生命在通史的场域中得到长期延续。”（胡海忠）正是在经史传统的历史传承之中，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体现出许多核心价值观念，如仁爱、和谐、中庸、天人合一等。这些价值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稳定传承和发展。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在中华文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承；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核心价值的稳定传承体现了中华文明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哲学思想的连续性的螺旋式发展。例如，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道家、墨家等流派的思想元素，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哲学体系；道家思想也在与其他流派的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种哲学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和包容性，也是其形成连续性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五个突出特性”的基础。它不仅体现在历史沿革的连贯性上，更体现在制度演进、语言文字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与传承上。这种连续性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与韧性，使其在应对各种挑战与变迁时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与完整性。正是连续性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使得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明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熠熠生辉。

当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中得以保持。这种创新并非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这种创新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依旧生机勃勃。

二 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创新性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不言而喻。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近平，2023年a，第480页）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创新是其赓续不断的关键所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着“一以贯之”的文明内核，因此中华文明的创新并非盲目追求新奇，而是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对旧有文化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解读和发展。下面笔者从艺术、制度与哲学思想几个领域分析之。

在艺术领域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表现卓著。无论是书法艺术的演变，还是绘画技巧的革新，抑或是文学艺术的赓续创新，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活力。书法字体（篆、隶、楷、行、草）的不断演变，每一种字体的形成都是对书写艺术的深入探索和创新。书法家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和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书法风格和流派。绘画与之类似，艺术家们在笔墨、色彩、构图等方面不断创新，形成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历代画家皆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艺术形式创新，使得中国绘画艺术得以持续发展和繁荣。而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文学体裁更是丰富多样，不断推陈出新。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起都是对前人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得益于其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的多元与创新，中华文明的艺术作品在历史发展中愈加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并为后世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遗产。

在政治制度上，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通过改革创新、调整社会制度，达到“与时偕行”的效果，确保了中华文明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体制之中。殷周之变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周人通过“立子立嫡”等制度革新，废除了商代残酷的人祭制度，建立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全新文明体系。这一变革不仅使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性走向成熟，更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周人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体现在思想层面。周公制礼作乐，将“天命”观念从神秘超验对象转变为理性自然法则，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战国时代的社会危机逐渐加剧，诸侯国兼并战争白热化，导致了多种政治制度出现：齐、鲁等地实行偏向分权自治的政治，秦、晋等地则施行以法为治的中央集权政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松散逐步走向凝聚。秦朝的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度。同时，秦朝还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这些措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朝的政治制度在秦朝的基础上进行一定调整和完善，形成了一套更加稳定和有效的政治制度。正是这种“与时偕行”的创新性，确保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上的创新与其背后的思想演进关系密切。尽管汉代之后中国思想以儒家为核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就停滞不前了。相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其发展历程本就是创新性的生动体现。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适时调整和革新，以应对时代的挑战。例如，汉代经学家董仲舒引阴阳、五行学说入儒，使儒家思想具备更广阔的宇宙视野；魏晋时期，儒家与道家结合，产生了玄学；宋明时期，儒家汲取道家、佛家的思想，发展出理学、心学等新形态。此外，儒家对于其经典亦不断丰富与阐释，从“五经”到“十三经”，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研究也迭出新见，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创新性还体现在哲学思想的多元融合上。儒、释、道三家思想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哲学体系。这种多元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传统文化是‘根’与‘魂’，是‘精神命脉’与‘重要源泉’……我们积极致力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非是陷入对过去辉煌的自我陶醉，而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理性反思，旨在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推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与发展。”（赖莹莹、詹石窗）

总的来说，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其通过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确保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历史传承上，更体现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习近平，2023年b，第3页）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创新性的重要性及其对连续性的保障作用。通过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更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三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作为“五个突出特性”之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如果说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成就了统一性，那么统一性又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呈现出其具体表达。这种内在逻辑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连续性与统一性共同成就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及其背后的理论架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造就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政治格局的社会实践又使统一性的文化特性不断走向深

入。因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仅体现在疆域的统一上，更深入到政治制度的构建、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等方面。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尧舜时期开始，中华文明便通过“制历授时”形成了一种超越部落联盟的政治合作模式。天子通过掌握历法来凝聚诸侯的向心力，确立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模式下，天子虽然直接控制的区域有限，但通过德治和巡守制度来维系与诸侯的联系，确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制度强调中央的权威和诸侯的服从，从而实现了超越地域的政治统一。这种统一性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荀子所言：“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非十二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推动了政治上的统一。特别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打破了封建制的世袭制度，由皇帝直接任命地方长官，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与法律体系，从而构建了高度统一的郡县制大一统国家。与此同时，经济上的统一也逐步推进，货币、度量衡等制度的统一，为商业交流提供了便利。

与制度统一相伴随的，是文化思想的一统。秦汉之际，经过几次不同学派的争论，最终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完成了思想的统一。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使得各地人民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共鸣，进一步巩固了文明的统一性。唐代以后，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政治制度上进一步成熟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包含农耕文明地区，还广泛吸纳游牧渔猎等不同文明地区，实现了更为广阔和包容的统一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之下，多元的内在机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机械的、没有生机的、铁板一块的‘一’，而是内含着多样性，蕴含着勃勃生机的‘一’。”（汪家琪、翟奎凤）这种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模式既注重各民族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通过羁縻制度、改土归流等措施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又通过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唐宋之后的中华文明在民族融合上表现得更为多元，但在政治制度上还是以传统中原文明的官僚制度为根本。例如，元朝在统一中国后，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政策，但在政治制度上仍然采纳此前的官僚体制，设立了中书省等中央机构，并实行行省制度来管理地方。清朝则更为彻底地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同时，元朝和清朝都推崇儒学，设立了国子监等机构来培养儒生。究其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中强烈的人文意识能够得到不同民族的认可。这种人文意识通过“六经”的传承和解释，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孔子述作“六经”，使得先王之道得以流传，为后世提供了统一思想和道德标准。历代经学家通过对“六经”的不断阐释和创新，不仅传承了古代文明，还推动了文化的统一和发展。儒家“六经”的思想核心乃是博施济众、万物一体的仁学价值观。这种仁学精神不仅关注个体道德修养，

更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统一。仁学通过构建一种超越血缘和地域的普遍之爱，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纽带。从早期的“华夏”观念到后来的多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这种认同超越了地域、血缘、宗教信仰等差异，将广土巨族整合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共同体。

正是得益于这种统一性特征下的文明模式，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进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运用相同的语言文字赓续文明，在生活中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和人伦价值，甚至形成了相似的审美观念。这些共同的文化元素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使得人们在统一的价值观念下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统一性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 求同存异：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赓续之路既有其内在的核心理念，亦有随着时代不断创新的华彩乐章。在创新的过程之中，“他山之石”为中华文明贡献了诸多智慧。作为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华文明，其在历史发展中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于交流中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文化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一文化共同体，除上文提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特性外，中华文明“求同存异”的包容性发挥了关键作用。《周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在这一突出特性的影响之下，中华文明尊重并接纳不同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通过包容差异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共生。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指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一种开放、接纳、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的特质。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为对多元文化和思想的尊重和吸纳，更是一种精神和道德层面的提升，即强调通过内在的境界提升来超越差异，实现和谐共生。

从历史的文化演进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根源于中华文明自有的文化突破内驱力。在从“前孔子时代”到“孔子时代”的中华文明产生期，形成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它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儒家哲学强调仁爱、礼制和中庸之道，道家哲学则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这两种哲学思想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在汉唐时期，道教从道家思想中脱胎而出，转化为中国本土宗教，来自印度的佛教也同时成功实现了中国化转向。此后，儒释道三家思想相互交融，形成了唐宋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这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其他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国都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包容，并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就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元素，并将其巧妙融入自身文化体系之

中。这种文化特性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使其在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中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得不同文明在交往中相互借鉴，在相互借鉴中互相尊重，在互相尊重中平等往来，这造就了中华文明在对外交往中的独特气象。无论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都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便利。例如，唐朝时期的长安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学者，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形式。这些外来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得到了尊重和吸纳，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成果。这种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文化互动与学习。中国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身的文化魅力，也积极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交融现象。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一，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与融合上，也“一以贯之”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它使得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吸收新鲜元素，保持其活力和创造力。可以说，包容性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冲击时能够迅速适应并发展。因此，包容性不仅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五 以和为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等理念，强调“以和为贵”，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这种理念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儒家强调“仁爱”与“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应和睦共处。即使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争端，儒家也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种理念使得中国在历史上更多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从思想演进的逻辑来看，儒家思想的“以和为贵”起源于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寻求和谐。它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并认为真正的和谐应当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谐为目的的多层次和谐。“在农业文明中，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甚至政治活动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节律的变化相一致。这种根源于农业文化的朴实的自然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顺天守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天人一体的观念。”（刘丰）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正是在基于“顺天守时”的“天人一体”思想，将对和谐的追求延伸转化为崇尚和平的精神。“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深远影响，引导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以包容、开放的态度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实现共同繁荣与和谐共处。因此，“天人合一”思

想不仅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哲学基础，也是推动天下大同的关键思想源泉。

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以和为贵”。这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追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主张“以和为贵”，认为和谐既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习近平，2022年，第24页）上述理念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时，以和平、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同时，“以和为贵”也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注重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强调家庭、社会、国家的和谐稳定。在传统节日中（如春节、中秋等），家人团聚、互敬互爱、共享天伦之乐，体现了中国人崇尚和平、和睦的精神。二是“和而不同”。这强调了差异性的和谐共处。它主张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即允许不同的观念、文化、习俗等共存，而不是强制统一。这种差异性的和谐共处，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反映了其对于多元共生的追求。“和而不同”主张通过交流和互鉴，实现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之间的互补和共生，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这种互补共生的思想，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特性中最为突出的内容，更是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上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包容性与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包容性为和平共处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平性则为包容性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作为“五个突出特性”之一，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传统文化，而且在我们的社会实践和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平性的理念及其实践，让我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继续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多元的世界。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2023年b，第8页）由此可见，脱离了文化的主体性，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显著问题。从理解与把握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诉求出发，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逻辑关系是紧密而深刻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连续性为其他四个特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就无从谈起。因为只有文明不断延续的基

基础上,才能实现积累创新成果、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展现包容心态和追求和平理念。同时,“五个突出特性”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连续性和创新性侧重从时间维度突出与呈现中华民族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统一性和包容性侧重从空间维度突出与呈现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和平性则是中华民族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关怀。总之,“五个突出特性”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正是有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才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并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古籍:《汉书》《礼记》《论语》《荀子》《周礼》《周易》等。

胡海忠,2024年:《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哲学基础》,载《中国哲学史》第3期。

赖萱萱、詹石窗,2023年:《论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蕴作用——基于“五个突出特性”的诠释》,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刘丰,2024年:《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特点及其当代呈现》,载《哲学研究》第5期。

汪家琪、翟奎凤,2024年:《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哲学基础和内在逻辑》,载《周易研究》第1期。

习近平,2022年:《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年a:《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年b:《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王 正